

CSSCI集刊

# 演化与创新 经济学评论

2018年  
第2辑（总第19辑）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8 年第 2 辑（总第 19 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演化经济学会 协办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由陈劲教授（主编）与王焕祥博士（执行主编）于2008年共同创办、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协办，是国内唯一一份致力于介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及最新发展的集刊，与国际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SSCI）、《制度经济学杂志》（SSCI）长期合作，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纳尔逊教授、伦德瓦尔教授、霍奇逊教授、陈平教授、贾根良教授等为本集刊特约编委与撰稿人。

本集刊以“倡导学术创新、彰显学术自由”为宗旨，力求为中外学者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与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也为展示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与思想提供一个机会窗口。

本集刊可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新的视野与借鉴，可供政府产业与科技等管理部门、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与科技工作者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经济学等社科专业的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对于想了解 and 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人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8年. 第2辑：总第19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协办.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3-059196-8

I. ①演… II. ①教… ②中…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3070号

责任编辑：马 跃 /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吴兆东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3/4

字数：183 000

定价：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主 编

陈 劲

## 执行主编

王焕祥

##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 安虎森 |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 陈 平 |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 |
| 何自力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 黄少安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
| 贾根良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罗卫东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 孟 捷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王缉慈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
| 王沛民 | 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 韦 森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 魏 江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 吴贵生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 吴晓波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 姚先国 |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 叶 航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张 钢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
| 张旭昆 |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     |              |

##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英文字母排序)

|                     |                 |
|---------------------|-----------------|
| Bengt-Åke Lundvall  | 丹麦奥尔堡大学         |
| Eric von Hippel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
| Franco Malerba      |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
| Geoffrey M. Hodgson |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
| Phil Cooker         | 英国卡迪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
| Qingrui Xu          | 中国浙江大学          |
| Richard R. Nelson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 Ron Boschma         |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地理学院    |
| Ron Martin          | 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       |

## 编辑部联系方式:

电话:0086-10-62792422

邮箱:ei\_review@tsinghua.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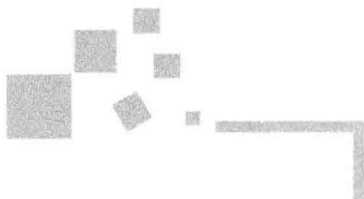
## 摘 要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近年来在国际学界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以及该理论范式主导下的创新经济学,展现中国学者在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取得的进展,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讨论提供平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刊收录的论文,内容涉及资本主义动态比较分析中的制度互补性、建立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级联的联系:生物技术的案例、基于 CiteSpace 的三重螺旋研究热点分析与趋势展望、VSBPC 模型:一个演化主义的 BPC 模型、领先市场研究的新进展、风险和使命导向型投资:开发性金融的新职能等理论命题与实践问题。

本集刊突出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演化及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特定领域内的应用等重要学术前沿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实践主题相呼应。

本集刊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学理思考与借鉴,可作为政府科技领域的高层领导、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管理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参考用书,对于想了解 and 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读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 目 录

|                                     |                                        |
|-------------------------------------|----------------------------------------|
| 资本主义动态比较分析中的制度互补性 .....             | Bruno Amable 赵晓军译 (1)                  |
| 建立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级联的联系：生物技术的案例<br>.....   | Jorge Niosi Maureen McKelvey 李 磊译 (19) |
| 基于 CiteSpace 的三重螺旋研究热点分析与趋势展望 ..... | 王成军 王肖肖 付祥云 (46)                       |
| VSBPC 模型：一个演化主义的 BPC 模型 .....       | 李 涛 (59)                               |
| 领先市场研究的新进展 .....                    | 邓久根 邹 伟 (93)                           |
| 风险和使命导向型投资：开发性金融的新职能 .....          | 贾诗玥 (104)                              |

# 资本主义动态比较分析中的制度互补性

Bruno Amable<sup>①</sup> 赵晓军<sup>②</sup>译

**摘 要：**制度互补性概念在资本主义比较分析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太过静态和太过功能主义一直是其饱受批评的原因，因为这种要求制度形式间必须完美配合的概念无法对变革进行解释。在了解制度互补性的概念及其在资本主义比较分析中的重要性后，本文认为制度互补性在解释制度变革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尽管如此，为了将其有效地融入制度变革的理论中，有必要对制度互补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为此，不应该再将制度看作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而应该将其定义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妥协。

**关键词：**制度互补性 制度变革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 F014

## 一、引 言

制度互补性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中（Amable, 2000, 2003; Aoki, 1994, 2013; Boyer, 2004; Deeg and Jackson, 2007; Hall and Soskice, 2001; Höpner, 2005）<sup>③</sup>，其目的在于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一定数量的制度形式同时出现时，会彼此加强，并促进特定制度配置、特定资本主义类型，或特定资本主义模型的功能运行、结构严密性和结构稳定性。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对制度互补性进行考察的重要性。制度互补性理论认为，互补制度间存在多个可能的组合，这与“制度配置只存在一种最佳形式，不同制度领域存在不同最佳实践”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制度互补性理论并不认为任何制度组合出现在一个既定的经济中都是可能的，或者在既定的时间里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制度互补性对于制度变革而言也是一个重要概念。乍一看，制度互补性似乎并不适合分析制度变革，因为制度互补性通常用来解释某些制度配置的存在和稳定性，制度变

① Bruno Amable, 巴黎经济学院、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学研究院教授。电子邮箱: bruno.amable@uni-paris1.fr。

② 赵晓军, 兰州大学和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贵州民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与制度变革、政府绩效管理。

③ Gagliardi (2014) 对制度互补性概念的使用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

革在这种解释逻辑下是较难发生的<sup>①</sup>。如果一定要说制度变革的话,至多可以想象的变化是系统强化。出于这些原因,制度互补性概念一直被批评太过“静态”,即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的制度变革;同时它也太过功能主义,即制度互补性认为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促进总体(经济)系统绩效的实现(Peck and Theodore, 2007)。制度互补性的经济功能主义观点虽然加上了主体行为和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但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处于功能退化阶段的制度配置可以得到修正,或者为什么一些运行良好的制度配置会发生改变。

然而,制度互补性既可以强化现存的制度配置,也可以削弱它(Amable, 2000)。制度互补性的强化作用已经引起大多数研究的重视,但是弱化作用在制度变革的分析中也值得考虑。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形式开始朝向某个方向变化,它将削弱其与其他特定制度形式已形成的互补特性的“正面作用”和自我强化性。在这种变化超越一定界限之后,曾经确保制度结构稳定的累积机制,同样会使先前稳定的互补制度变得不再稳定。影响某个制度组合的一个“局部”变化,也许也会对其他制度领域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与之互补的其他制度。制度变革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某一社会系统的重大变革,甚至解体。由此可见,制度互补性概念并不是只能在制度多样性的静态理论中发挥作用,它也可以在解释某些制度形式的弱化和消失方面大有作为。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一些制度形式会朝向最终会损害整个制度配置稳定性的方向发展?这将我们带回了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改变一个所有构成要素已经完美匹配的系统的某些部分?例如,在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Hall and Soskice, 2001),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均能获得稳定性,这源于它的经济竞争力,可以通过两种制度的不同组合方式来实现,即在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中两种制度的相互协调(coordinated)和在自由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中两种制度的较少协调(或者完全没有协调)<sup>②</sup>。这些机制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全部演变为自由经济类型而主流经济学却通常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经济关系日益全球化而导致的竞争压力的增大,将导致协调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各自的特征得到加强。为了变得更具竞争性,每种资本主义类型都将变得与自身特性更加匹配。如果将经济理性考虑在内,那么这种“殊途同归”的过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行动主体理解,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动机要求激进的制度变革,相反,他们将要求既定形式特性的加强(Soskice, 1999)。

然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模型在过去几十年的演变并没有为这种“殊途同归”提供辩护。放松规制、民营化和雇佣关系的个体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许多依赖于管制、政府干预和集体谈判的资本主义形式(Jackson and Deeg, 2012)。尽管如此,我们也仍未观察到一个朝向自由市场模型发展的普遍趋势。通常用于解释一些组织或制度安排是如何被引入和适应而不是简单地被移植到现存制度配置中的概念——“杂交效应”(hybridisation)(Callaghan, 2010),为解释当前许多制度变革提供了一种方法,但是该概念也难以对现

<sup>①</sup> Howell (2003) 认为“制度互补性产生……重要影响……制度间会彼此强化,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集合……(进而)抵制变革”。

<sup>②</sup> 选择“协调”这个术语来概括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特征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也存在协调,只不过相比所谓的“协调”市场经济而言,自由市场经济的协调方式是不一样的。

实制度变革的背后机理进行解释。

本文认为,一个未包含经济功能主义,以及根植于制度和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互补性理论,能很好地用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持续发生的制度变革。第二部分概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中制度互补性概念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对制度互补性理论在解释变革问题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提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能够克服经济功能主义解释的缺陷,并有助于“制度互补性和变革”理论的形成。

## 二、比较资本主义中的制度互补性

制度互补性概念是 Aoki (1994) 在借鉴 Milgrom 和 Roberts (1992) 对企业内部组织互补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的。将制度定义为博弈均衡策略并使用 Topkis (1998) 提出的超模博弈策略,我们可以分析某一领域博弈主体的均衡策略是如何与同一领域或其他领域中的其他主体的策略相互补充或者相互影响的。因此,一个博弈可以有几个解,反映出不同的制度组合,其稳健性取决于博弈主体最优策略的互补性。

最普遍的关于制度互补性的理念是,一项制度的运行绩效取决于另一项制度的出现或者运行状况。强化另一项制度的影响或者弥补它的缺陷表达了相同的理念,即两项或者多项制度可以共同促进既定结果的产生。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在经济系统中承担的功能进行考察。然而,将功能纳入考虑范围并不意味着要吸收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即制度的出现、持续、消失不一定直接与这些功能相关。

尽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规制理论才提及制度互补性 (Boyer, 2005),但是早期研究已经以某种形式提过这样的思想<sup>①</sup>。规制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分析建立在两种社会关系——市场竞争类型和劳资关系形式——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 (Boyer, 2007),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累积过程。更一般地说,累积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五种制度形式——竞争、劳资关系、货币和金融体制、国家,以及一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方式——的融合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主义时期 (结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盛行的一种“相当有效”的制度配置 (Boyer, 2007),其特点就是劳资双方妥协的实现成为可能,工人接受泰勒式的工作组织方式以换取生产效率决定的工资增长。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促进了累积机制的稳定发展,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国际关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下趋于稳定,这些都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凯恩斯式的逆周期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

这些互补的制度形式的“效率”可以通过福特主义劳资妥协造就的充分就业、高利润、生活标准的持续提高等指标予以体现。尽管如此,互补性这一“令人惊喜”的要素一定不能被忽略。正如许多后期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所强调的 (Martin and Swank, 2012; Streeck and Yamamura, 2001) 执行宏大计划的系统构建者是缺乏的,因为互补性是在事

---

<sup>①</sup> Boyer (1981) 认为,“劳资关系……仅仅是标识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其中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结果是,随着变革日益影响资本的集中、国家的角色和劳动的国际分工,其未来配置不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自身与外部的联系”。

后发现的。

制度互补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比较分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Aoki (1994, 2001) 在分析日本主银行制度和日本企业互补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日本经济的理论模型。日本企业的特色是团队生产, 企业产出是不确定环境下团队每一个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企业依赖外部投资者对必要的生产资本进行投资, 投资者不能直接观察到企业的实际产出。团队成员必须通过一定的努力获得产出以换取工资。企业管理的目的是提高工人间的互惠行为, 但是这只能尽力而为, 因为监管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必要设计一个权变治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下, 产出剩余分配决策 (即外部投资者的应付报酬已经在合同中进行了明确说明) 的改变和团队的存续取决于最终产出的实现。如果团队的持续性下降到一定水平, 那么扮演事后监管者角色的团队外部主体, 将成为剩余索取者, 团队因此而解体。这种事后监管机制为团队成员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 促使他们的努力程度达到必需的水平。这种特殊的事后治理机制与团队的生产组织方式相互补充。换句话说, 日本金融体制是与其工作组织方式互补的一种制度形式。相反, 以高强度资金激励机制和低程度团队合作为特色的美国, 由于团队合作的相对缺乏, 绩效和奖励的个体化特色则比较明显。

制度互补性也出现于资本主义类型的理论中 (Hall and Soskice, 2001), 用于解释导致两种不同生产体系出现的强化机制, 其中第一种生产体系依赖于专业技能的持续提高和投资的稳定性, 而第二种生产体系则取决于一般技能的持续提高和对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的迅速反应。在第一种生产体系中, 有利于强化专业技能投资的激励机制 (就业稳定、工作安全、社会保障等) 和有利于行业长期战略发展的制度 (企业间协调、银行金融体系) 之间是彼此互补的, 因为每一种制度形式都强化了另一种制度形式的效率, 以产出具有竞争性的结果。

其他互补类型出现在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国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分析中 (Amable, 2003)。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型中, 产品市场竞争使企业对严重的需求或供给震荡更加敏感。如果价格调整不能完全吸收这些震荡, 那么数量调整, 尤其是劳动力数量的调整, 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因此, 产品市场竞争导致了就业灵活性需求的增长。市场竞争压力也促使企业调整它们的经营战略。通过对有利于快速重组的金融市场的迅速反应 (劳动市场的灵活化有利于这种快速调整), 经营战略的调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种经济模型支持快速调整和结构变革, 同时也必须承担特定投资带来的高风险。竞争也扩展到了教育系统中, 中等教育的多样性使得大学为吸引优质生源而展开的竞争和学生为进入重点大学而展开的竞争显得更为重要。

在社会民主模型中, 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意味着生产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这不仅可以通过解雇工人和市场调整来实现<sup>①</sup>, 也可以通过对高技能工人进行再培训来达成 (以提高工人的适应能力)。对雇员特定投资的保护可以通过合法性的就业保护、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以及“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等方式的综合作用来实现。高度协调的工资谈判系统造就了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团结工资体系 (solidaristic wage setting)。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企业制定长期战略。欧洲大陆模型具有一些和社会民主模型

① 劳动力从低效率的企业到高效率企业的转移除外。

共同的特征。虽然工资谈判可以协商，也制定了团结工资政策，但是该模型在程度上与社会民主模型还是有差距的。

相较于欧洲大陆模型，南欧资本主义模型则建立在更多的就业保护和更少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较低水平的产品市场竞争及因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导致的短期利润限制的缺乏，使得就业保护较易实现。尽管如此，有限的劳动力技能和教育水平使得执行高工资和高技能的行业战略是不可能的。

亚洲资本主义模型依赖于与国家合作的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sup>①</sup>，这使得企业制定长期战略成为可能。对工人的特定投资受到实际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就业保护，同时公司内部的再培训对就业保护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的缺乏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不仅使得风险分散变得尤为困难，也使得大型企业的稳定性对于该模型得到社会和政治的认同显得尤为关键。

### 三、制度互补性和制度变革

以上有关制度互补性特征的描述可能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认知，即学界虽然对制度间的完美匹配进行了描述，但未给除系统强化外的变革留下空间<sup>②</sup>。当然，以上出现的制度互补模型都是理想型的，并非是对现实经济的实际描述。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调在对现实经济进行理论分析时所使用到的一些关键特征，而非对现存配置所有可能细节的全面描述。为了分析资本主义多样性而使用的理想类型是想要说明现实中的经济体系永远不会改变，或者现在的经济形态一直都存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接近于新自由主义模型的经济体（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或者继承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制度，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更接近于欧洲大陆模型的妥协机制。资本主义大多是管理型的，融资和股东的作用受到限制，劳资关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带有社团主义的特色，工会的角色不容小觑。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和保守党改革期间，这些国家经历了一个快速向新自由主义模型演化的阶段。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通过制度互补对资本主义现存模型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因为这会产生误导性的结论。不同资本主义模型的历史建构不一定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维系起着重要作用的不同制度间相互补充”的内在逻辑。制度之间的黏合性和合理配置几乎很少是宏大设计的结果。大多数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互补性特征实际上直到事后才出现，某种制度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并非是为了与另一制度匹配才出现的。例如，在日本资本主义模型中，“不完美”（这种不完美是基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所界定的）的劳动力市场和集权化的金融体系之间的互补性并不是这些制度形式的同时创生所造就的（Streeck and Yamamura, 2001）。日本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出现于 20 世纪早期，当时的雇主都力图减少过多的人员流动。主银行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

① 这一模型仅限 OECD 国家中的日本和韩国，而不是整个亚洲大陆的国家。

② 也可参见 Pagano (2011) 的研究。

执行,目的是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这两种制度形式的相互补充更多的是源于偶然,而非其他<sup>①</sup>。Martin 和 Swank (2012) 也指出,如丹麦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出现宏观社团主义制度的原因在于企业界愿意建立强大的多部门联合体,以此来对抗以追求自身利益和提升个体计划为特点的民主制度的威胁。讽刺的是,高水平的协调在 20 世纪更为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不应该被理解为制度互补性概念在分析制度变革方面是毫无作用的。制度互补性和变革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得到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制度互补性会阻碍变革的发生,或者即便是促进变革,也只能加强制度间的整体配置。Hall 和 Soskice (2001) 的资本主义类型理论提出的能够强化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间差异的“殊途同归”思想佐证了这一观点。制度演化沿着增强经济竞争性的路径发展。竞争性被认为在协调市场经济中随着协调的加强而加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随着自由程度的加强而加强。因此,环境中外生因素的改变,如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带来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会强化两种资本主义类型各自的特征:协调市场经济会朝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而自由市场经济会朝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sup>②</sup>。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变革,会减少协调市场经济的协调或者增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制,这将导致内部经济绩效的降低。在 Hall 和 Soskice (2001) 的理论中,这种变革会遭到核心主体——企业——的抵制。

然而,在具有协调经济典型特征的德国所观察到的演化过程与这种简单的预测是相互矛盾的。正如 Streeck (2011) 的研究所显示的,在过去的 20~30 年,德国的重要制度已经明显朝向非协调方向转变:行业性的集体谈判逐渐衰落,谈判系统明显朝向更为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介组织和协调经济中关键主体的作用下降,内部动态机制必须调和日益增长的紧张态势;社会模型朝着具有更多市场导向和更少社团导向的方向发展;银行业关系遭到破坏,在一系列资本市场的立法改革后德意志银行解体;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德国企业雇主发起了一系列解构原本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关系系统的行动……这些演化的共同特征是:尽管“存在大量不同部门间的偶然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并不像是在自我稳定系统中我们所期待的对负面反馈的抵抗,因为自我稳定系统会消除外部或内部的震荡以维持系统的平衡”(Streeck, 2001)。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没有阻止德国经济体系成为更为松散和更不协调的系统。

然而,事实上,系统相互依赖的特性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如果制度朝某一方向的改变可以通过互补作用加强系统的黏合性,那么向相反方向的改变则会通过相同机制导致系统的紊乱和制度功能的失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外部性会转变为负外部性。

因此,第二种关于制度互补性和变革间关系的观点是制度互补性会导致系统变得更

① “在大型企业内部,雇主和员工的权利是相互依赖的,但是两者间的协调是通过他们各自与管理的联系间接实现的。两者的共同演化是由被称为‘后进者保守主义’的特定历史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战前各种公司治理模型所固有的紧张态势)所形塑的……非自由公司治理的经济互补性或凝聚性不是必然的,而是非计划的相互匹配的结果。随着不同制度以零星方式重新组合,非自由模型开始‘整合在了一起’,并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承担起新的功能”(Jackson, 2001)。

② “我们认为国家政治经济是经常经历外部震荡的系统……这些震荡通常将破坏经济主体长期协调形成的均衡态势……我们期望企业……完善它们的实践以维持它们的竞争优势……因而,许多调整过程将以增强竞争优势的制度再生为方向”(Hall and Soskice, 2001)。

加脆弱。该观点还提出了有关制度负向变化源头的问题。系统演变逻辑与之前的探讨是正好相反的。与向更具黏性和更具稳定性的方向演变的轨迹不同,系统会变得更加松散和不稳定,这甚至是由制度配置的某一细微部分发生微小变化所造成的。因此,制度互补性会导致一个模型变得更为脆弱,尤其是在互补机制更为强大和制度配置更为紧密的情况下,系统脆弱性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向资本主义市场模型方向的演变已经可以在法国和意大利( Amable and Palombarini, 2014; Amable et al., 2012a, 2012b)、德国( Streeck, 2011)、日本( Lechevalier, 2014; Magara and Sacchi, 2013)、瑞典( Schnyder, 2012)等非自由经济体中观察到。经济金融化、金融市场发展、公司治理改革、股东权力的增大、集体谈判的衰落、民营化、福利国家收缩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非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对工业企业直接融资的锐减深刻地影响着亚洲、欧洲大陆和社会民主模型。20世纪80年代瑞典金融体系迅速自由化,尽管在199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但是瑞典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法国在80年代有着与瑞典同样的改革路径( Amable et al., 2012a);德国在90年代也随之采取同样的做法,同其外国竞争者一样,德国银行更加致力于市场活动而不是直接对企业进行融资;这种趋势也影响到了日本,日本银行发挥着财政资助和财政控制的双重作用,以确保稳定的股权持有,而过去日本银行不会出现在工业企业的资本运作中。所有权的稳定性急剧下降:在1991年大约43%的工业企业资本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一比例到2002年仅为26%。在诸如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中,金融自由化已经导致了大量外国投资者的出现,2007年外国投资者持有公开交易数量的25.5%,而这一比例在1990年仅为4.2%( Isogai, 2012)。

给予股东在决定企业目标方面相比雇员更多的优先权,直接导致了公司治理的重大变革:相比以往,企业更多聚焦于财务收益而不是就业维持;在财务绩效激励措施方面进行更多的管理控制和调整。这些要素是盛行于福特主义时期的管理资本主义的妥协性管理特征逐渐衰落的表现:过去为了支持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联合,在雇员和管理者之间达成的或多或少的非正式妥协可能将一去不返。

约束雇员关系的制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所有非自由模型。在诸如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韩国和芬兰这样的国家中,针对长期雇佣合同的就业保护立法已经急剧减少<sup>①</sup>。在一些国家中,不仅仅是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以被观察到,而且影响着劳动力边缘人群而不是核心人群的部分自由化也有迹可循。针对临时合同的就业保护立法不仅在诸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这样的国家中大量锐减,在诸如瑞典、丹麦和比利时这样的典型“协调型”经济体中也急剧减少。2013年,德国非典型就业(定期合同、兼职、临时合同、微型或小型工作)的比例约占总体就业的24%(女性为35%)<sup>②</sup>。低薪工人的比例略低于25%。而在丹麦该比例为10%<sup>③</sup>。

亚洲资本主义以企业层面的工资关系的重要性为特征( Yamada, 2000)。工作保障

① 参见附录。

② 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

③ 2010年的数据取自 Rhein(2013)的研究,也可参见 Thelen(2014)对德国、丹麦和荷兰在自由化演变轨迹方面进行的比较。

(终身雇佣)并没有惠及全体雇员,而只是针对核心雇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做法已经在逐渐减少;许多国家长期合同的比例在降低,临时雇员的数量在增加。在 90 年代前期,日本非长期合约占全部雇员合同数量的 20%,而到了 2005 年,这一比例已经变为 1/3,临时雇员正在成为日本雇佣关系的主要形式(Yamada and Hirano, 2012)。不稳定和临时就业数量的增加在韩国也有迹可循(Ok and Yang, 2012)。相似地,工资谈判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说,更加有利于企业的这种演变)已经影响了所有重视集权(国家)控制或协调的国家,如瑞典(Schnyder, 2012)、日本(Isogai, 2012),甚至是法国和意大利(Amable et al., 2012a, 2012b)。2008~2013 年,部门协议的数量在希腊已经从 202 份减少至 14 份,在西班牙从 1 448 份减少至 543 份<sup>①</sup>,在葡萄牙从 200 份减少至 46 份(2012 年)(Müller and Schulten, 2014)。集权式的协调方式已经日益向接受“适度工资”(在一些情况下,是工资削减)的方向转变,而不是在福特主义时期通过分配生产所得来达成劳资双方的妥协(Boyer, 2004)。通过制度之间的互补,特定领域内的制度变革已经对其他领域产生了影响。民营化不仅导致了私营企业法律地位的改变,也常常导致企业雇佣关系类型的改变(Schulten et al., 2008)。民营化已经抑制了宏观社团主义的发展,转而支持微观社团主义的发展,这与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型是更为一致的。雇佣关系已经朝向私人合同和自我雇佣的方向演变,劳动力分化日益加剧:核心雇员和边缘雇员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

类似地,经济金融化增加了实现高额短期收益率的压力,这使得确保雇员获得一定程度的职业保障变得更为困难。金融市场的扩展也导致了与公共福利系统形成竞争态势的私人服务(商业保险等)的出现。尽管不可能全面检验一项制度领域变革对另一制度领域的冲击作用,但是表 1 对新自由主义结构变革对资本主义非自由模型的解构作用进行了概述。

表 1 新自由主义结构变革和制度互补性

| 结构变革     | 雇佣关系                                                                                    | 产品市场竞争                                                        | 社会保障                                                                                                                           | 金融系统                                 | 教育系统                                                          | 财政政策                                   |
|----------|-----------------------------------------------------------------------------------------|---------------------------------------------------------------|--------------------------------------------------------------------------------------------------------------------------------|--------------------------------------|---------------------------------------------------------------|----------------------------------------|
| 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 ☆ 个体化特征更为明显;对关系专用性(co-specific)资产(技能等)投资的减少<br>☆ “市场化”技能需求的增加;低技能工人就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和工资增长压力的下降 | ☆ 对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减少导致以质取胜的生产模式的减少<br>☆ 低技能工人的低工资加大了他们在价格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性 | ☆ 抵御就业风险(作为应对就业保障减少的措施)需求的增长<br>☆ 集体谈判的减少(雇佣关系的个体化)使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投入更加难以得到保障,以及更难被政治和社会接受<br>☆ 就业不稳定性的增加和非典型就业的增加使社会贡献决定资金分配的体系遭到破坏 | ☆ 商业保险(作为应对就业保障减少的措施)需求的增加有利于金融部门的扩张 | ☆ “市场化”技能需求的增加要求重新定位教育系统,以满足劳动力市场(企业)的需求<br>☆ 企业对课程设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 ☆ 雇佣关系个体化特征的增强和集体谈判的减少使财政再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大大减弱 |

① 同一时期,西班牙集体协议覆盖的工人数量已经从 1 200 万人下降至 570 万人。

续表

| 结构变革             | 雇佣关系                                            | 产品市场竞争                              | 社会保障                                 | 金融系统                            | 教育系统                    | 财政政策                       |
|------------------|-------------------------------------------------|-------------------------------------|--------------------------------------|---------------------------------|-------------------------|----------------------------|
| 产品市场自由化          | ☆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更加不情愿维持工人就业的稳定<br>☆企业对劳动市场放松规制的需求日益增长 | ☆企业竞争压力增加<br>☆民营化有利于确保私人寡头垄断的地位     | ☆竞争加剧增加了企业对降低社会贡献的需求，从而危及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筹措 | ☆民营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使“财政最优化”实践更易实施；有利于财政资金的竞争 |
| 社会保障缩减           | ☆与劳动力市场波动相联系的收入风险增加；就业保障需求的增长                   | ☆对工人专用性资产保护的减少；影响生产的专业化<br>☆社会贡献的减少 |                                      | ☆商业保险需求的增加                      | ☆“市场化”技能需求的增加           | ☆公共支出和税收的减少                |
| 教育系统改革（民营化、收费增加） | ☆分化加剧使得统一工资体系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不平等加剧                    | ☆更少强调特定技能；使一些生产变得更加困难               | ☆工人分化的加剧使得获得统一系统的支持变得更少              | ☆在学生贷款方面私人融资需求的增长<br>☆有利于金融化的发展 |                         | ☆公共支出和税收的减少                |
| 金融系统放松规制         | ☆利润目标重要性的增长；需要承担放松规制和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成本                | ☆工业企业金融化的增长（利润目标、短期主义等）             | ☆商业保险系统竞争的加剧                         |                                 | ☆学生贷款供给的增加有助于教育系统的民营化   | ☆公共借贷条款的改变<br>☆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增加  |
| 财政政策变迁           | ☆再分配的减少使得工人收入更加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工资                    | ☆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变得更加难以制定；加剧了商业周期的变化        | ☆成本节约压力增加                            | ☆有助于金融部门的发展                     | ☆公立教育融资变得更加困难；民营化教育得到发展 |                            |

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结构变革已经持续了至少 30 年的时间（金融自由化和民营化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尽管资本主义多样性相比以往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多样性的现实依然存在。因此，通过具有负向作用的制度互补引发非自由主义模型的消亡似乎是非常缓慢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存在于理论模型中的制度间的紧密配合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型相比理论中的模型要更为松散（Streeck, 2005）。在文献中出现的制度互补性模型是理想型的，其不可避免地简化了一定数量的关键特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在不危及“正向的”、系统强化的互补体系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变革依然是可能的。甚至朝向“错误”方向发展的一项变革可能并不意味着严重解体的发生，而有可能只会导致有限的调整。

尽管松散代表的“不完美”能对模型存在的不稳定性进行解释，但是它依然不能对“当其他制度发生重大改变时，一些制度形式为什么依然存在”做出一般性的解释。这种被称为“杂交效应”的现象已经在一些有效的模型中被发现（Boyer, 1998）。其理念是：将外部要素引入一个既定的（有效）系统中会导致被嵌入部分的调整，嵌入系统又

会导致另外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杂交效应”不是系统黏合性的损失,而是新的互补性的创生。将这样的理念引入宏观制度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容易。在未弄清楚可以导致稳定制度结构产生“杂交效应”的作用机理之前,“杂交效应”本身依然是个不严谨的概念。

为了克服该概念的局限性,有必要放弃对旨在评估制度间互补性的制度形式(集权还是分权,市场导向还是协调导向,等等)的关注,转而聚焦于导致制度互补、制度稳定或制度变革的原因。在采纳 Hall (2005) 避免使用“功能主义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转向制度政治经济学来考察不同的互补性。

#### 四、互补性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 1. 政治经济学与制度

通过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演化是经济动态变化和政治权力平衡演变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的分析思路(Palombarini, 2001; Amable, 2003; Amable and Palombarini, 2005, 2009)。政治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政治妥协(socio-political compromise)。社会群体(以及组成群体的个人)由于处在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sup>①</sup>,会表达不同的政治诉求,政治主体通过特定政策或制度设计可能会满足他们的诉求,也可能满足不了。政治主体的决策取决于不同群体政治权力的强弱和对政治支持能力的大小。根据权力累积的政治逻辑,公共行动倾向于满足政治强势群体的需求。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表达不同的诉求,因此满足社会系统不同群体的多样诉求是有可能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些诉求不合时宜或完全与其他诉求相互冲突,政治主体将选择性地保留一些诉求,而舍掉其他诉求;前者是支配性的利益诉求,而后者则是被支配的利益诉求。政策执行取决于支配性社会群体间妥协达成的方式。这些支配性的社会群体被称为支配性社会集团。当支持政治主体制定的政策方针的支配性社会集团存在时,社会冲突便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而支配性社会集团一旦解体,危机便会随之而来。

尽管经济发展会影响支配性社会集团的生存能力,但是后者并不能简化为前者的指标。在经济“绩效”和既定制度结构的稳定性间没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尽管低迷的宏观经济表现可能意味着对现状不满程度的增长,并产生变革的压力<sup>②</sup>。例如,通过增加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可利用的资源数量,经济增长可能导致社会妥协的产生,也可能增强既定资本主义模型的生命力(资本主义模型是制度结构、政治战略和支配性社会集团的多元组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应该会减少社会秩序的紊乱,使得妥协的达成变得更为容易。尽管如此,类似的演变模式却很少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分配问题一直是调节社会冲突的核心障碍,一方面,经济增长一般意味着生产结构和其他动态机制的

① 利益是主体认知的;是社会建构而非“客观”既定的。

② 宏观经济低迷也是制度变革倡导者可以利用的理由,有助于他们传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和“有些东西需要改变”这样的信息,关于结构变革的文献通常称这些行为是“危机意识的创造”(Boeri et al., 2006)。

改变,这些改变很可能会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失衡,给某些群体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机会,而给其他人带来损失和更高的风险。因此,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政治权力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群体的期待和诉求的改变,进而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支配性社会集团变得更加脆弱:支配性社会集团的权力平衡可能会被打破——一些群体会日渐衰落,而另一些群体则会日益强大,变革带来的新诉求在现有的社会妥协框架内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一些支配性社会群体的重要性也许会提高,这使得将他们从支配性社会集团中排除出去变得更为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许会改变原来在一个国家内部已经达成的稳定妥协。跨国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使得以前曾在一国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不再稳定<sup>①</sup>。

支配性社会集团的解体意味着由现存的制度框架、政治战略和支配性社会集团成员所共同界定的约束条件的放宽,从而拓展调解的空间。

## 2. 互补性与制度层级

制度和变革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直接影响着制度互补性的界定。根据认知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制度互补性划分为两种类型。对社会群体而言,如果两种制度的共同出现可以增强群体凝聚力或保护群体利益的话,它们就是互补的。一方面,企业管理者也许会发现金融自由化和劳动市场放松规制是互补的,因为两者可以联合作用共同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金融自由化使管理者获得大量的附加价值,而就业保护的减少使得工资成本“节约”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工人可能发现社会保障和集体谈判在保护他们的利益方面是相互补充的,集体谈判会增强工会在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方面的影响力,从而为工人提供更充分的保障。

相比社会群体而言,政治主体对互补性的界定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主要从自身获得大型社会团体支持的角度来界定互补性,因此互补性的概念界定必然与支配性社会集团的形成密切相关。互补性的制度指的是通过政治协商空间的扩展可以共同促进支配性社会集团形成或维持其稳定的那些制度。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互补性被界定为一种功能,但是不同主体需要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社会群体的目标是增加他们的利益;而政治主体的目的是获得政治支持。两类互补性对应的制度形式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企业来说,劳动市场放松规制和金融系统自由化是两种互补的制度,原因在于它们可以共同促进企业利润率的增长。然而对于政治领导来说,这样的搭配可能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政治领导需要支配性社会集团(至少包括一部分以工资为生的工人)的支持,劳动市场管制或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与金融系统自由化也许就是相互补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不同群体间的妥协将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互补性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技术”范畴的概念:根据生产函数均衡,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观察到两种或多种制度共同作用带来的经济绩效。社会政治互补性被界定为支配性社会集团的稳定性,取决于组成支配性社会集团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因此,该概念是基于历史情境的。

---

<sup>①</sup> 国际协定(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等)意味着一些可能与某些国家制度相冲突的约束条件的产生,进而使得一国范围内达成的妥协和共识不再稳定。